

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

作者：马勇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5-30

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
(2005年10月27日于抚州，马勇)

各位同仁：

受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的委托，我代表会议组委会对本次会议进行小结，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和补充。

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及中共抚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在中共抚州市委特别是蒋建农副书记的大力支持下，会议开的非常成功，我们不仅进行了很深入细致的学术交流，会晤老朋友，结识新朋友，而且在中共抚州市委宣传部的周到安排下，参观了广昌县的一些革命遗址，拜谒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读书岩，品尝了享誉中外的南丰蜜桔，观摩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抚州戏剧，领略了临川文化的非凡魅力。抚州不愧为具有历史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文明之邦，这里人杰地灵，先后涌现出王安石、汤显祖、曾巩等一大批杰出人士。短短的几天时间，使我们全体与会者对抚州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我们衷心感谢中共抚州市委特别是市委宣传部的诸位领导热情周到的接待与安排。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研讨中国现代文化，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五十余人，共向会议提交论文四十余篇，其中有提交论文而因故未能到会的有十余人，会议共交流讨论论文近三十篇。这些论文涉及到现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论题广泛，讨论深入，至少具有如下特点：

一、对中国现代文化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清理。

学术史研究是十年来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课题，也是中国学术规范化的应有之义。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欲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就必须对已有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议组织者就委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先生进行了专门的准备。左教授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前沿》年报的课题，熟知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及问题。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左教授如数家珍，为会议作了一个《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进展及未来趋势》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细致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以为在新文化史或称为社会文化史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化研究较十多年前有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动向，人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选题的范围更大，学术范式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旧有的问题获得进一步的开拓，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左玉河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会上和会下的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左玉河的报告对于开拓现代史学者的眼界很有帮助，对于未来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必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对左玉河教授过于推崇新文化史或称为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判断表示了不同看法，以为左教授对现代文化的主体即现代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精英层面的研究进展略有忽视；有的以为左教授的报告稍显零碎，对于十年来现代文化研究概括不够。

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是最近十年来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一般学术史的探讨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一批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学者对于许多分类学术史的探讨似乎尚未顾及，这方面的成果相当有限。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副教授向本次会议提交的关于西方“文化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论文，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文化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初步梳理了文化学的文献状况，是一篇极具学理性的论文。该论文是赵教授系列课题中的一篇，作者主要是对文化学文献进行清理，力图建构西方文化学在中国引进、萌生的真实状况，相对忽略了西方文化学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因此讨论中有学者建议，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对文化学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对梁启超、章太炎直至梁漱溟等人的相关著作予以关照。

江西财经大学陈始发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专门探讨十年来“文化现代化”问题研究的进展，并仔细辨析了研究存在的问题。文化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学者们无不将中国社会的进步归结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与愚昧，于是有“全盘西化”等一系列主张。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学者的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学术界的风气有了根本改观，根据陈教授的研究，有关“文化现代化”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基本上走出“全盘西化”的论式，更多地趋向于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对于陈教授的论点，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所谓“走出全盘西化”的判断显然以偏概全，并不足以反映“文化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现状。事实上，随着中国与世界逐步融为一体，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站在全人类的视野下关照东西文化，创造新文化。

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烟台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的俞祖华教授、赵慧峰教授进行过系统研究，相关成果已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他们这次合作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专门探讨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综述，引起与会学者的高度兴趣。

二、选题范围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拓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兵提交的论文《北京的城墙》根据北京档案馆保存的文献仔细研究了民国年间北京或北平市政当局关于北京城墙的保护、利用及破坏的全过程，这对于我们了解古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两难困境很有帮助，这一视角对于现代文化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显然是现代城市发展史的深化，未来势必会照此趋势演化出不少相关选题。

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李自典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的论文、李小尉关于抗战初期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彭贵珍关于近代中国城镇居民婚姻观念的探讨，都在论域的开拓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本次会议的一大贡献。现代文化既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积淀与转化，本次会议收到有几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文化现代化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于开拓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范围很有好处，它至少告诉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既要注意西方的因素，更要留意中国的过去文化遗产的积淀。

三、相当一批论文对过去旧有的课题进行深化与创新。

毛泽东的思想贡献与局限是现代文化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触及到这一主题。常家树教授的论文系统探讨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研究与运用，以为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现代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不过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为毛泽东虽然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并运用社会实践中去，但毛泽东的研究与运用其负面作用似乎大于正面影响，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连刘邦、朱元璋等很少文化的开国者都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可治天下的道理，知道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与民休息，恢复社会生机，而毛泽东却在建国之后一再发动阶级斗争，从而使社会生机迟迟得不到恢复。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悲剧似乎正在他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精髓缺乏真正的理解，他所知道的只是谋略，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之所在。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又是其中最主要的构成。自从丁守和、曾彦修、郭德宏等人揭示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根本不重视民主，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括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远不如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更为全面，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忽视，或许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民主的意识。这个看法几年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后来的定本中有“大众的，即民主的”修改，以为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主，批评曾彦修、郭德宏等人的看法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曲解。郭德宏教授向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是怎样修改“大众的即民主的”，通过对十几个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以为毛泽东的这一重大修改或许在1945年，而不是一些学者强调的在1949年之后。至于这些修改是否表明毛泽东更加重视民主，郭教授也从学理上进行了严密论证，坚持自己的观点。郭教授的论文以小见大，论证严密，不论是学理上的论证，还是版本上的考察都为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范例，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称赞。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有一篇论文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启蒙运动的转折，强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所传播的西学内容值得重新考察，其价值与意义也值得重新估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教授的论文主要探讨五四时期新旧、中西冲突的历史过程，以为五四时代文化冲突的基本问题是五四思想家没有辨析清楚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旧课题，最近十年来基本上不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勇研究员向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从现代化的立场上关照、反思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得失，以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不希望建立高度集权的新政府，他们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一种尝试，是在经典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显然，马勇的这一看法是对传统观点的颠覆，是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价值的重估。

四、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关怀。

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范围宽广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过去的历史，也应该对当下的文化现象予以适度的关注，抱持学者的人间情怀。本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汉国先生的《当代北京城镇居民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虽然将论域限定在1992年之后，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重要的启示，即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开拓范围，不仅要研究现代城镇居民的一般生活状态，而且应该更深入地探讨居民生活方式的各种细节，应该用量化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给予更加清晰的说明。

与朱汉国教授选题相近的还有武汉大学副教授李勤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李勤的研究不仅详尽探讨了大众文化的本质，揭示出大众文化就其特征而言具有进步性、教化性、固定化、暂时性、易变性及盲目性等，并由此提出对大众文化的目标建构应该注意予以适当的引导，注意与世界文化竞扬所长，协调发展，注意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注意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武汉理工大学郭国祥教授的论文探讨了文化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紧张以及如何保持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问题，也同样充满着学者的人间情怀。作者认为，对文化的世俗性应该保持适度的容忍，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过高地要求世俗文化的超越性，即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去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然而，在容忍的同时，也要对文化的超越性时刻予以关注，使文化的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必要的张力。内蒙古自治区党校田步双教授的当代中国“人情文化”研究，以为中国文化中的人情意识有正面功能，而在当下建设法制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更多地具有负面效应，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越演越烈，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的人情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适度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演进与问题，是人文学者应有的责任，即便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现代史学者的人文关怀势必会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有效扩大中国现代文化的论域，促进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本次研讨会老学者如风采依旧，思想解放的勇气不减当年，青年学者意气风发，茁壮成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老交替正在顺利进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未来可期。

原载《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10期，2006年1月14日。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蒋梦麟：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部长
- 下一篇文章： 曾国藩和理学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地质调查所沿革诸问题考
- 蒋梦麟：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
- 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 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 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
-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 “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
-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新文化运
- 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
-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